

老字号的当代价值何在?能否在展现老字号的历史脉络与形象中,重塑其与当代人的精神联系与市场魅力?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的播出让这一系列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在中国,人们心中的老字号从来不只是一个经营成功的品牌、企业。能称为老字号,其历史往往可以回望百年;老字号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商界传奇,往往体现着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整整100年前的1924年,经过差不多10年的努力,范旭东、陈调甫、侯德榜等有志者创办永利碱厂,本着“哪怕失败也要败自我们这一代人,不要遗后世”的决心,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纯碱。实际上,正是缘于范旭东看到生产出的碱如此洁白而提议称为“纯碱”,使“纯碱”一词进入中国人的词汇,而且逐渐替代了当年流行的口碱、洋碱。

在中国,很多老字号也不只是曾经提供了受人们欢迎的产品,更是与重要历史事件有隐秘而重要的联系。1995年在天津体育馆举行的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的冠军决赛,天津729体育用品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球拍胶皮,助力中国乒乓球队三位主力运动员超常发挥,助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重回巅峰,也

重塑老字号与当代人的精神联系

——大型系列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观感



陆小华

改变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用外国器材参加世界比赛的历史。

在中国,老字号能成为人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其发展历程不仅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重要事件相关联,往往同时也因其体现济世之愿、助民之利而被世人所接受、所依赖、所记忆。1930年,有人在天津针市街创办了一家制药厂,生产一款新型解热镇痛药——止痛丸。这家药厂后来改名力生制药厂,而小抽屉式包装的止痛片至今仍仍在守护人们的健康。

在中国,老字号并不只是小门小店。作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但如何制作上百个精密微零件并组装成可精准计时的戴在手腕上的精密仪器,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尚无答案。1955年3月24日下午5点45分,在天津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块机械手表“五星”。老字号“海鸥”就是中国制表工业的一个开端。

老字号的故事不能仅仅是传说,更不能只是档案室的积存。要让老字号的价值发扬光大,就要用更具传播力、感染力、说服力的方式,以当代人更易接受和记忆的创意设计、表达方式、传播策略,重新诠释这些老字号的创业故事、当代价值。让当代人从新的角度和层面重新认识、拥抱身边的老字号。

正因如此,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老字号 共潮生》的推出,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这部系列纪录片的立意是颇具匠心的。首季《老字号 共潮生》推出的30集纪录片,每集聚焦一个老字号,从人文故事、品牌工艺、地域文化等不同角度切入,不仅展现了创作团队在珍贵档案资料的精彩发现,呈现老字号历史的精彩节点,而且重在探寻、发现、放大老字号如何认识、理解自己的当代使命,如何适应当代人的需求而创新发展。

客观地看,展现老字号如何勇立“潮”头,更需要创作团队的独特眼光和见识,才能见一般人所未见,才能激活老字号的形象魂魄,重塑老字号与当代人的精神联系。

杨柳青年画是天津人耳熟能详的。但《老字号 共潮生》中的其中一集《杨柳青画社》的开端,从“美,是漫长时光中的心灵传递”切入,讲述了一个徜徉于6597块明清古版之中的年轻彩绘传承人是如何尝试“老版复生”的。这集片子不仅画面精美、创意独到,而且重新诠释了杨柳青年画的历史与当代价值。短短8分钟的纪录片,其基础,是导演、总撰稿孙磊对杨柳青年画的系统深入研究。翻阅其在天津教育出版社的新著《点缀年华——大运河上的年画故事》就可看出,她对杨柳青年画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是建立在遍访包括冬宫在内的俄罗斯各大博物馆,研究了许多国内难以看到的清代、民国时期杨柳青年画真迹的基础之上的。8分钟的纪录片《杨柳青画社》,不过是其厚积薄发的结果。

实际上,这代表着《老字号 共潮生》的总体品格。
(作者为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讲席教授)

津门名家谈艺录(十八)

李鹤年:书法与收藏互补

章用秀

李鹤年(1912—2000),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高等学校书法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日本中国书法学院名誉教授、中国褚遂良文学美术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与李鹤年先生相识,是在和平书画会,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的光景。那天他是从葛沽过来的,先生温文谦恭,毫无自矜之色。几次见面后,我专程到先生蜗居在重庆道的一个楼梯间与他聊起了书法。楼梯间小得可怜,坡顶,闷热,仅有一点点生活日用品。我那时正犯胃病,先生倒是有着一罐麦乳精,忙沏一杯递给我。

李先生的书法,清逸儒雅,极富书卷气。点画之间,毫无剑拔弩张之戾气、俗不可耐的市井气和江湖气。评论家说:其篆隶于邓石如已登堂入室,与吴让之、赵之谦可以并驾。特别是他的篆书,多年前吴玉如先生已有不及之许,也颇得日本友人之赏识。其行书,楷得吴门衣钵,尤善榜书,不少学校、商店匾额多出其手。此次造访,先生谈到他的学书经历:

“叔祖海楼、濬源,清末民初有名当地,五岁跟外公学执笔,开始临池。十八岁拜孟广慧为师学汉隶,不久又开始跟兄长王襄学篆书,自此五十年来未尝间断。随孟、王学习书法的同时,兼学甲骨、金文、碑帖考据之学。二十四岁在南开大学开始随吴玉如先生攻古典文学,同时专心于行书、草书。四十年随侍左右,耳提面命,书学大进,遂成四体。天津解放后更师事方药雨考鉴汉唐碑版。与陈保之、胡厚宣、商承祚诸先生在师之间,不但书学更进,眼界亦愈开阔。”

立夏时节,内人医大的同学有一个小范围的聚会,地点选择在黑龙江的肇东。我是作为内人的专职司机和家属列席的。过去,肇东称“满沟”和“甜草岗”。先说“满沟”。这个地名源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修筑东清铁路(今滨洲铁路)时,在今天的肇东镇设了一个火车站,名“蒙古站”,当地谐音“满沟站”。“甜草”之名则是因这个地方是一片岗地,盛产甜甘草,人称“甜草岗”。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甜草》,讲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肇东”者何意呢?原来肇东位于肇州之东,肇州、肇源、肇东,俗称“三肇”,故取名“肇东”。在汉语中“肇”有开始、发生、造成之意,“东”则是指太阳升起的方向,象征着万事万物的开始和吉祥。

先前,我曾去过肇东,肇东离哈尔滨仅60公里的路程,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它是黑龙江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我对那里的印象主要是当地的小吃。我所知道的肇东特色小吃,有肇东烤饼。肇东烤饼很薄,而且不大,操作者用小刷子蘸上辣酱、香油、孜然,放在炭火上烤制,然后再撒点葱花末,卷起来吃。到了夏天,肇东人喜欢吃“饭包”,满族人称“乏克”。这是我听黑龙江老诗人刘畅园告诉我的。具体做法是,用新鲜的大白菜叶卷上小米饭加上鸡蛋酱,或肉酱、茄子酱都行,再加上黄瓜条、水萝卜,很好吃,而且清凉解暑。还有一种小吃,就是肇东的茄子酱,是将茄子和土豆在大铁锅里蒸熟后,加上荤油、盐、葱花等,再将土豆捣成土豆泥,把茄子也捣烂,拌在一起,非常好吃。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肇东的“大酱炖鱼”。这是我一个朋友专门拉我去吃的。他说,老弟,肇东的大酱炖鱼特别好吃。他告诉我做这种鱼,必须是松花江新打上来的开江鱼,开江鱼的肚子里非常干净,把鱼用东北大酱掺上当地产的小米,炖整整一宿。干炖豆腐炖鱼嘛,那家伙能香死个人。朋友对这种做法介绍,本身就是一个诱惑。我喜欢美食,和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偏爱地方美食小

凤凰山下,有一条小河,很窄,却很长。小河从山上流下来,流经下游的阡陌,汇入另一条河,奔向不远处的长江。小河的枯水期,河底只有薄薄浅浅的一湾水,轻轻地流着。到了春夏两季,如遇大雨,河水涨上来,几与岸平。山下的溪与河,大抵都是这样,一年里会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一是清浅脉脉,如含情般;一是混浊汹涌,似莽夫样。小河之上,有两棵老枫杨树,树龄有三四百年了,树根在小河两岸,树干却在河面上约两米处合而为一,人们称之为相

为一条河流命名



章铜柱

思树。跨越一条小河的相思,有趣也形象。当地人把这棵树编了一个美丽而伤感的爱情故事,广为传诵。每年七夕,或是春秋佳日,总会有一些青年男女,特意寻树而来,在树下牵手,或是将红丝线、红绸条系在树枝和河边的栏杆上,默默祝福或祈祷爱情。有一年,当地人为那条无名的小河征名,相思河从众多名字中被选中,那条小河因此有了一个好听而又温暖的名字。在相思河边走走,会让人想起自己的爱情。

老家村庄的东边,有一条河,从南面的山区蜿蜒流来,不知其源流所在,村庄里好像也没有人在意过这件事。村东的河不宽,宽处不过二三十米,窄处只有十米左右。小河从南面流来,流到村庄东边时,形成一处面积约数亩的河湾,小河就势在此转弯,向东流去。河湾以前被村民开垦成水田,可在汛期,栽下去的秧苗常被水淹,后来就荒弃了。夏天,那处不深不浅的河湾倒成了我们戏水的乐园。村里

肇东行之录

阿成



吃。只是我一直没搞明白,为啥炖鱼还加小米儿呢?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我记得那是一家小饭馆儿,普通、简单,但是,这种样子在当年的县城却不奇怪了。掀开脏脏的门帘子进去,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土屋,两三张桌子,谈不上干净,也谈不上埋汰。老板是一个近50岁的中年人,老板、上灶、跑堂、收银,都是他一个人。朋友告诉我这家伙没儿没女,也没老婆,也不知道他是结过婚还是没结过婚,先前就在江上打鱼,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开始研究大酱炖鱼。这是他独创的。

当时我们只要了一条鱼,这条鱼是朋友提前一天预订的,那条鱼足足有三四斤重的样子,特别好吃。通过吃大酱炖鱼我认识到,不管您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厨,做鱼,渔民才是顶高手。可能是那一次来去匆匆,让我对“三肇”印象平平。更不知道我是怎样得出了“三肇”是个贫穷的地方的印象,也误认为“三肇”在黑龙江似乎也不是特别有名,而且这种糟糕的印象竟跟了我20年。

这次小聚会加上我和内人一共是六人。此聚主要是研究哈医大25届毕业生40周年的“同学聚会”。这几个人是发起者也是组织者。同学们都非常重视这个聚会,提前一年就开始筹划相关议程,还写了会歌。据说,上一次聚会的时候,一个已经定居在美国的朝鲜族同学专程从美国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他在同学聚会发言的时候特别激动,泪流满面,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

的孩子常常聚在那儿,打水仗,学狗刨式的泳姿,或是捏着鼻子潜入水下扎猛子,在河湾里稍深些的地方偶尔也能摘到几个鲜嫩的菱角来解个馋。村东的河,村里人都叫它东边河。这个名字不知道是村里谁先叫出来的,已经无法考证了。名字土气,听着却很亲切。后来,东边河随着村庄一起消失了。有时,我还会梦见东边河,梦见和我一起河里戏水的童年伙伴。梦里,那条小河的名字,就是故乡。

西溪南又称丰溪,在皖南的徽州,是我喜欢的村落之一。第一次去西溪南是在夏天,那时正下着雨。雨中的西溪南,枫杨更绿,粉墙黛瓦的人家,在烟雨里恍如仙境。我站在丰溪的桥上,望着溪中的水,又望向远处朦胧的山影,低头抬眼之际,那些灰白色的墙、深墨色的瓦、枫杨树在雨中湿淋淋的绿意,勾勒出了另一种生活情境,是我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场景。走过溪上的石桥、木桥,站在溪边的石埠上,看溪水碧绿潺潺,忍不住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那个好听的名字:丰溪、丰溪。

皖南屯溪的镇海桥,面对三江口。我曾很多次在桥上徘徊,看附近的华山、屯溪老街、黎阳老街,看远山,也看眼前的率水、横江、新安江。率水与横江在此汇聚,流向下游,便是新安江。在汇聚于此的三条河流中,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率水。1934年5月,徽杭公路通车,都达夫和林业堂、潘光旦、叶秋原、全增嘏等一行数人来屯溪,夜里就住在镇海桥下的小舟中。“浮家泛宅,大家联袂接脚,在筏篷底下,洋油灯前,谈笑着,悠悠入睡的那一种风情”,是迷人的。“第二天,天下了雨;在船上听雨,在水边看雨的风味,又是一种别样的情趣。”镇海桥建在横江上,往下是新安江。过黎阳老街,便是率水。率水中,有自然形成的长条形小洲,面积数千平方米,或数百平方米,洲上多碎石,也多乌柏、杨柳之类的树木。我喜欢沿率水岸边走,边走边看小洲上的那些树,它们随风雨流水塑型,自然率性。

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句子,“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很多河的名字,并不是我们取的,可是那些名字,听起来,想起来,却是让人感到温暖的。

题图摄影:苑思恩

刻本上的字没有风神,有点傻呵呵的,我们管那上面的字叫“痴冻蝇”,即像是冬天的苍蝇吃得肥了,跳不动了,飞不起来了,这样的字怎么能学呢?比如你临写《九成宫》,用的是翻刻本,字画就有些肥,作为收藏当然不值得,作为习字的临本更是够不上。”“还有的碑帖也是不可取的。”鹤年先生说,“由于原本凿刻时,刀子不是直下的,初拓时,碑的本身尚无剥损,拓出的笔画看着略肥,其实是原作。随着岁月的流逝,碑的年代越久,笔画剥蚀程度越大,以后拓出的本子反而笔画细了,其实也是失真。过去有所谓“洗碑”,“洗碑”并不是将碑用水洗一下,而是在原碑上重刻,把瘦的笔画刻肥了。这样一来,拓出本子也就失真了。”

鹤年先生认为:“质量好的印本完全可以作为临写的范本,好的印本百分之百地传神。尤其是珂罗版印的碑帖,清晰程度也会,绝少失真。学习书法一定要选最好的拓本,不然也会走弯路。”

学习鉴定与研究书法共同进步并且相互融合,收藏与鉴定并行不悖,并且相互促进。我在纪念李鹤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书法艺术研讨会上说:“李鹤年先生作为一个当代的书法大家,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起点高,涉猎广。鉴定为他奠定了坚实的书法基础,书法又促使他更深入地从事鉴定,收藏使他的鉴定具备丰富的资料,鉴定又增长了他收藏的眼力和层次。”这就是李鹤年先生所走的道路,这是他在治学和艺术上不断拓展的基本因素。他真正是在碑帖上、在研习古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汲取了营养。

满庭芳

第五二七〇期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了这次同学聚会的机会。”说罢,跪在地上咣咣咣给大家磕了三个头,搞得同学们哭笑不得。

其实,我原本不打算去肇东,我又不是他们的同学,再说咱学历太低了,中专生。大学生和中专生之间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呢?坐在一起会比较尴尬。更何况,这几位都是全国有名的医学专家,实打实的大腕儿,咱不尴尬才怪呢。您想想看,一个老年人的尴尬是怎样一副样子吧。内人说,同学聚会的事儿几句话就完了,主要是吃杀猪菜,还有你常吃的大酱炖鱼。你去不去?我立刻说,去。人在江湖,脸皮儿太薄肯定不行。

接待我们的是内人医大的两位同学,这二位同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肇东,分别是当地两家医院的院长,也是省内医界的翘楚。肇东到了。而今天的肇东和我先前曾经来过的那个肇东,已不可同日而语。简单说,而今的肇东特现代,主干道是八车道。开始我还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安排到富丽堂皇的大酒家去吃。要知道在那样高档的地方吃杀猪菜和开江鱼,不对路啊。结果不是。他们选的一条偏僻小巷里的一家老馆子。如此看来,医生不仅会看病也能读懂人的心理。我们进去一看,热气腾腾,座无虚席,随口说道:“这儿真有人间烟火气啊。”那个满面汗渍的女服务员随口接了一句:“最抚凡人心。”

我们被安排在二楼单间儿。所谓的单间儿也不是真正意义的单间儿,里面用半堵墙还隔着另一个单间儿,已经有客人了。桌面上主要是杀猪菜,内有酸菜、五花肉、血肠、肥肠,有点儿类似火锅。除此之外还有拆骨肉,各种熏酱,如酱猪耳朵、酱猪肝、酱猪蹄儿以及猪肚、肥肠等,再加上一大盆子灿然锃色的蘸酱菜。还有香喷喷的炖大鲤鱼(鱼),并不是咱心心念念的大酱炖鱼。我略感遗憾,心想,跑这么远不就是想吃大酱炖鱼吗?不过转念一想,人这一生哪有十全十美的。常听说“人应当有求缺意识”,我虽然没求缺,但人主动缺了,这不是很好吗?这样,就有了下次来的盼头了。



松声阵阵(油画) 刘顺常

神州大地,一方一俗。农历六月初六这一天,我们这里有晒东西的讲究。农历六月,在家乡梅雨季节多近尾声,恰逢小暑大暑节气,气温升高,有时会高达40℃左右。汉代刘熙曰:“暑,煮也,热如煮物也。”六月初六正当盛夏,是一年中太阳极猛的日子,据说这天晒过的东西不易生虫。

晒什么?读书人晒书本,普通人晒“红绿”(衣物)。

读书人嗜书如命,民间有把六月六称为“晒书节”的说法。每年六月六这天,很多读书人都会将藏于书房里的各种线装书籍搬出来,与阳光来一次热烈的相会。一本一本,一页一页,那些躲匿的虫子,在太阳的驱逐下逃之夭夭。关于“晒书节”的起源,有两种颇有意思的传说。一说唐代的高僧唐三藏从西域取经途中,过海时经书不慎被海水浸湿,所以在六月六这天把经书拿出来晒干,久而久之,六月六就成为一个吉祥的日子。另一种说法是,清朝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在六月六这天把自家的藏书搬到院子里晾晒,正好被微服私访的康熙帝遇见。康熙帝认为朱彝尊如此这般爱书,日后必能堪当大任,遂破格封其为翰林院检讨,负责专修明史。这两种虽都为传说,但很多读书人认为六月六是个吉祥的日子,纷纷效仿,在这天也把家里的藏书搬出去晒晒,以图个好彩头。

六月六晒书是文人雅士们的趣事,而芸芸众生,皆以粗茶淡饭、人间烟火为生活的日常,正所谓“六月六,晒红绿”。“红”“绿”自然就是人们日常所用的五颜六色的衣裤被褥。

回味总是在中年后反复发酵,越来越浓。想起很多经历过的六月六,天似乎都拒绝了雨水,或许是老天爷垂怜人,怕晾晒在外的东西被雨水打湿吧。

还在酣梦中与周公嬉戏时,母亲宽大的手掌就拍在我们几个孩子的屁股上——今天六月六,你们快点起来搬东西到地坝晒太阳。

热,是这个时段我们最厌烦的词儿。我们知道,一开始搬运东西,又得汗流浹背,于是嘴嘟起老高:“妈,不就几件衣服吗,你们大人搬一下不行吗?”偷懒,总是要理由充分,我们都摇头又睡。

不知几时,父亲的竹篾片刺痛了我们,我们蹦将起来,赶紧加入搬运东西的队伍中。一支队伍,浩浩荡荡,晾晒的东西颇多——暂时不穿的衣裤、鞋帽、被褥。不一会儿,偌大的地坝,成了红的世界,绿的海洋。

父亲说,每人把自己床上的竹席、稻草也搬出来晒晒。在乡村,人们买不起棕垫,只在竹席下面铺上厚厚的稻草,一是暖和,二为舒软。我们这里地处江南,每年的梅雨季,撩得人心头也颇有些阴晦晦涩。农村的房屋,依山靠水,加之绵绵不息的梅雨,那些贮藏妥当的干燥衣裤被褥,也不免有些潮湿。如果梅雨过多过密,多半会生出霉菌。为了预防生虫、返潮,每年的六月六,村里人就把它拿出来晒晒太阳。

农民是很辛苦的,他们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我家六口人,五人上坡干活儿,还得留一人看守晾晒在地坝的“红红绿绿”。自然,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年幼的小妹一人了。看守这些“红红绿绿”,不仅要预防天气突变,还怕猫啊、狗啊、鸡啊、鸭啊前来践踏。

中午返家,母亲把煮饭的任务交给年长的姐姐。母亲叫上大哥,与她一起将晾晒的东西翻面——自然是那些诸如被褥的笨重东西,这是为了全方位、多角度晾晒吧。

火热的阳光总有收敛的时候。圆日的太阳从远方的山脊上滑落下去,母亲的呼喊声响彻在空旷的田野——回家收捡东西了!每一件衣裤,每一床被褥,每一根稻草,在母亲的严苛里,整整齐齐,原路就緒。

“六”在中国人的传统里,是个吉祥美好的数字。“六月六”,双“六”,不就是吉上加吉吗?谁不愿意沾上一些吉祥的喜气呢。

题图摄影:王晓燕

六月六,晒书晒衣物

徐成文

